

目 录

本世纪上半叶门头沟中、西医概况	孙宝瑛, [马润新](1)
解放初期宛平县的医疗卫生保健及斋堂医院	张万顺(6)
门头沟十三会、九龙山庙会和琉璃渠茶棚	安久亮(13)
圈门的道经会	董秀森(21)
聂老富	史梦兰(23)
灵水举人刘增广事略	包世轩(26)
周自齐生平及其墓地	加来顺(30)
从国民剧院到大众剧院	李元强(32)
禁采煤碑	刘义全(34)
忆修建同塘铁路时民工的悲惨生活	王绍才(37)
记解放前一次“劳资仲裁”会议的始末	巴松坡(40)

本世纪上半叶门头沟中、西医概况

孙宝瑛

马润新

解放前门头沟（指门城地区）隶属河北省宛平县。由于盛产无烟煤而闻名遐迩，传说当地居民乃由先后两支移民组成。远在明王朝时期，一支移民队伍来自遥远的一贫瘠地区——山西大槐树（属哪县已无可考）；另一支则是在清乾隆年间来自江南的苏浙一带。上述情况的出现可以断言，与当时政治、经济以及交通等因素有密切的关联。

由于煤炭的开采，经济得到发展，门头沟地区人口逐渐增多。到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这里已有住户四千多，人口逾两万（东辛房至官厅），再加上各矿窑数以千计的流动工人，其人口总数，已大大超过丰台、长辛店、庞各庄等宛平重镇。

由此看来，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地区，医务人员是如何的需要了，事实上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20—40年代，门头沟先后出现的中药店就有同丰德、三义堂、同义堂、恒裕隆、育生堂、同悦堂、天德堂、庆生堂、宝奎堂、仁义堂、文生堂、继德成、大仁堂、纯德堂、宏济堂等十五家之多。上述药店，都有主方大夫（解放前，市郊和农村，均称中医为先生，西医为大夫，为符合现在社会上习惯，下文对中西医的称呼，一律称为大夫），即便经营小量批发中草药的同丰德药庄，也有过他自己的大夫。那个年代门头沟的药铺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以看病为主，以卖药为辅，而且大夫们不仅“坐堂行医”（坐堂指坐在他们各自的药铺），而且到处出诊，形成一支既分散又庞大的医疗队伍，为社会贡献了力量。

门头沟西医大夫的出现，是在二十年代中叶，圈门里有曹仲三，西辛房则有张景信从人行医。稍后几年，地方上在面门开设过简易诊所。殆至三十年代晚期，由圈门到孙各不足二里长的街道上，则出现私立医院三所，它们是临安医院，进德医院和兴亚医院，规模挺大，实际上也不过都是个小诊疗所而已。三所医院没有一张病床，每所医院的医护人员，不超过三人，其中大部都是大夫的家属。在东辛辛房、龙门、河南街、河北街一带，只有一位德才兼备的李石清，他在这一人口稠密、劳动群众最多的高上办了一个诊所，满足了当时社会上的需要。

以下首先将孙文翰、董旺、孙宝珍、孙华儒等几位知名度较高的中医大夫的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一、孙文翰，字西圃（1880—1969），系中医世家，自幼从父学医，二十岁时即开始了医生生涯。1916年又拜乡亲王先生（名字不详）为师，习针灸，由于他聪明好学，很快就学得一手好针法。次年，用龙门村自来的房子，开设“锡巖堂”中药铺。孙大夫主内、外科、妇科，对小儿麻疹、天花、及妇女胎前产后诸症，尤为专长，还能针刺嗓子疳疔（扁桃腺化脓），并且是针到病除，医技神奇，在门头沟地区有口皆碑。

孙大人行医方式，大部时间是出诊，因交通不便，一般是徒步，远一点的地方，患者家属以小毛驴接送。无论是严寒酷暑，风晨雨夕，哪怕是星稀疏，夜深沉，万籁俱寂的时刻，只要有人来请，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立即上路。

孙大夫怀有救死扶伤之心，急人之所急，帮人之所需，故他出诊到某一个村落，即便有些患者没有请他，他也要顺便看看，从而使一些危重病人及时得到抢救。他还打

“医不叩门”的老框框，随时为人们解除病痛，因此博得乡亲们的衷心爱戴。

孙大夫治病，不收诊费，只收药钱，对贫困患者只收成本费不取微利，对一般富有者，公平收费，对为富不仁者才多收一些钱，以弥补减免药费的亏损，这是孙大夫对“穷汉子吃药，富汉子还钱”的领会和具体做法。

孙大夫医术精湛，针法神奇，有这样一个事例：二十年代初，宽街宋殿元之子宋二羔年仅四、五岁，忽罹重病，宋请来巫婆（俗称香头）医治，香头焚香叩头，弄得满屋香烟缭绕，把孩子浑身缠上红头绳，此时病儿已神志不清，四肢厥逆，还时而出现拍风现象，二羔的病情加剧，生命已如游丝。此时宋殿元请来了孙先生，孙诊断出病儿是表热入里，闷疹不出，于是上针刺“百会”、“风池”、“合谷”、“人中”、“涌泉”等穴，方使病儿四肢渐渐有了温热感，神志略有清醒，又喂以清热解表的药物。当夜麻疹逐渐表出，病儿完全清醒了，后又复诊数次，病儿即告痊愈。高殿元自然感激不尽，逢人便说“是孙先生救活了我的孩子”。自此孙大夫名声显赫，时年仅三十许。

孙大夫有二子，长子孙宝珍，次子孙宝瑛，三十年代初，他们都在青少年时期，即先后从父学医。孙大夫本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精神，在教授其子学医的同时，即晓以“做人”的准则，他逐字逐句的教儿子们读《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温病条辨》、《汤头歌》、《脉诀》、《本草纲要》等医学名著，有的要求必须背熟，有的要求理解道理。在学习实践中，自然认药、抓药等是基本功了。

孙大夫制订了“三要、三不准”的行为规范严嘱宝珍弟兄，严格恪守。三要是：①要专心学习，在医术上精益求精；②要有高尚医德；③要作风正派，以博得乡亲们的信任和爱戴。三不准是：①不学成、不得到政府许可，不准行医；②不准欺骗群众，要实事求是地对待患者及其家属；③不准接触不肖之徒和赌博的人。

二、董旺，是门头沟著名中医之一，现年74岁，本地人，世居贫瘠山地里十三的王村，自幼家贫，缺衣少食。好年成时还要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歉年就更糟了，断炊绝粮，自是常事。1922年，可怜他都只有三周岁的弟弟，患春瘟夭亡，全家悲痛欲绝。小董旺从无比悲愤中坚强的挣脱出来，他要使自己家的不幸遭遇，不在“得病没钱治”的乡亲们家重演，于是，他暗下决心，伺机学医。可是好运气不会轻易降临到穷孩子身上，几年后，年仅十三岁的小董旺，又逢歉年，无以为生，只得背井离乡，去寻求活路，几经挫折，才于1931年经一好心人介绍他到圈门里育生堂小药铺学徒。在那里他和所有旧社会学徒一样，三年零一节未出师之前，完全处于被奴役的地位，想学点真本领那是白日做梦。他师傅育生堂店主李汉卿，虽说也是当时门头沟知名的中医之一，但对徒弟董旺也只是偶尔地在医道上给予他一些指点，董旺心想，要想学会治病，只有靠自学了。于是，他靠着有限的文化知识，凭他天资聪颖和超人的毅力，开始自学了。李汉卿虽然为人吝啬，但对他唯一的徒弟，自学点灯熬油，还是睁着一只眼，合着一只眼，不多限制。董大夫出师后，过了一段时间，到了三、四十年代回育生堂与李汉卿合作时，他已与当时既有学历，又有临床经验的，后来居上的孙宝珍大夫，难分轩輊了。董大夫对医术精益求精，深受患者的尊敬和爱戴。

董大夫用唯物辩证的方法治病，大胆尝试，并获得了成功。

1941年，董大夫54岁的舅父安子庚患瘟疫病，发高烧，已神志昏昏，烦躁不安，经他诊断为瘟病内蕴，处方大剂清瘟败毒汤，用生石膏四两（125克），病人服后已略渐安

定。但其家属认为石膏用量过大，二煎不敢再吃，这样，烦躁的病状反而加重了，口渴想喝水。复诊时董旺考虑，服大剂后，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经分析得出结论，不是由于石膏分量大，而是分量小，遂又改四两为半斤（250克），并向病人家属讲述加重药量的道理，求得对方方的信赖。服药后，病情果然减轻。紧接着又换为轻剂，石膏二两（62.5克），使其连吃两剂，终于退热，体温趋于正常。后来又先后发生大便秘结，旬日不通和周身浮肿的病变，死神再一次向安子庚招手了。经董大夫查明病变的部位和之所以发生的诱因，进行严格的对症下药治疗，终于使老人病体痊愈。董大夫用唯物辩证法治疗获得了成功，展示了他“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的高超医疗技能。

董大夫用四诊八纲，伤寒六经辩证诊治疾病，并结合现代医学（指西医治疗常见病）对阑尾炎、肺炎、肝炎等症的治疗取得了良好效果。这在解放前，门头沟的个别保守思想深重的中医大夫，竟发出这样的哀鸣：“董旺已经十足的离经叛道了”！董旺用六经辩证治疗妇科胎前产后经血不调、不孕等症，也收到了较为理想的效果。

董大夫行医以来，一直恪守其父“有钱治病，没钱也要治病”的教导。有一年四、五月间，痢疾流行，他发现三个乞丐在闹痢疾，便及时主动地给与无偿治疗。他这种行为，决非沽名钓誉和炫耀自己，完全是他高尚医德的的自然流露。

三、孙宝珍大夫：系孙文翰长子，少时即随父学医，1936年考入学制六年的“北平国立医学院”，因为他当时已有一定医学基础，插班入学，两年毕业，当时的同学有杨润芳、刘鸿宾等人。1937年北平市卫生局举办中医考试他以第三名优异成绩被录取后，在宣武门外西琉璃厂挂牌行医，主治“臃肿鼓胀”，因疗效好，治愈率高，报纸、电台广为宣传，不久他在北京市就小有名气了。三、四年后，他回到故乡门头沟，在圈门里开设同悦堂药铺。由于其父老中医孙文翰的声誉，加上他自己的医术精湛，很快孙宝珍的名声一就传遍方圆几十里地。他治疗肝病腹水、鼓胀，很拿手，对妇科杂症，也极有研究，专治妇女产后温热病，善用黄连鸡子阿胶汤和大定风珠、小定风珠。1942年春夏之交，笔者记得忽患周身不适，不思饮食，烦躁，但不发烧的少见病，十多天不愈，时已服过宝珍三、四副汤药，在一次复诊时，我问孙宝珍：“大哥，你看我是什么病？”孙答“我还说不清楚，改改方子再吃两剂怎样？”我点头表示同意，又连服两剂后，果然病情减轻了，不久即告痊愈。

由此看来，孙宝珍既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又有强烈的责任感，这种高尚医德是值得赞扬的。

孙宝瑛小于孙宝珍三岁，远在40年代初期开始行医（当时政府许可），就其于临床学知识和临床经验而言，实不愧为中医世家。值此门头沟区老中医故去的故去，退休的退休，患者深感不便之时，年逾古稀的孙宝瑛大夫，仍坚持在区医药公司欣荣药店上班，奉献余热，主持门诊，大大方便了群众，赢得了人们的高度赞扬。

四、孙永禄大夫（字华儒），门头沟人，生卒年月不详。二、三十年代行医，四十岁。他早年曾拜王先生为师，是孙文翰的师弟。由于他天资聪慧且有一定文化水平，故对内、外两科都是里手，善于辩证施治，能深入细致地为患者检查病情，诊断准确，不失为一代良医。孙大夫言谈风趣，能察言观色窥探人们的内心世界，在治病上确实有一套，不知多少垂危病人在他手下得救了，神奇的疗效为人们津津乐道。

1933年夏，孙华儒的斜对门董水库之子董长海时年二十岁，患霍乱，吃了孙大夫的

几副药，没有见效，眼看着人就不行了，孙大夫握着董水库的手说：“找别人看看吧，我算无计可施了”，董说：“大哥，现在我找谁？我的情况，你还不知道，靠做点小买卖，季节性的卖元宵，瓜子，住辘干哇啊，现在咱们死马当活马治，只有你能帮我这个忙”。孙十分同情，便点头答应了。孙华儒吸食鸦片烟，回家便取来全套烟具，帮长海吸了几口鸦片，当夜就止住了吐、泻，病情好转，长海得救了。现在长海是退休矿工，虽然已逾古稀之年，但仍健在，他常常和后代人谈起这件往事，对孙华儒大夫十分敬仰和怀念。

华儒之子孙瑞深，子承父业，仍以行医为生。解放后，在我区西部山区大村公社卫生院主持业务多年，对缺医少药的山区群众做出了不少的贡献。他虽已故去数载，当地的老年人偶尔提到他时，仍有唏嘘之感。

五、李石清，原籍北京，已退休。三十年代即来门头沟西辛房行医。李大夫医学造诣很深，临床经验丰富，是位知名度相当高的西医大夫。李大夫从来淡于名利，在旧社会与地方上官吏豪绅素无来往，即便是同行熟人，偶有往还，也淡淡如水，他的业余爱好是唱京剧。在往昔与同好，则是有点来往，一旦某同好飞黄腾达，平步青云了，与他们的关系立即疏远起来，据说都不是缘起对方。

李石清大夫行医收费标准，总是比当地、当时其他医生要低得多。由于他生活俭朴，倒也可以维持。这不难看出他为社会服务，治病救人的宗旨。记得在敌伪统治时期，三家店的殷某人，一次略带威胁的口吻忠告他：“李大夫，照你这样干（指收费低廉）别人就没法干了”。但是殷这番话，丝毫没有改变李大夫的做法，“我行我素”始终不提高他的诊费标准。

李石清大夫，从社会生活中的大量事实，对穷汉子吃药，富汉子还钱的传统说法，持否定态度，其实，承认和否定，都是对的。上文曾写过“穷汉子吃药，富汉子还钱”的事例，但都是医生们通过一些手法，迫使富有者治病多花一些钱，当然有明有暗，真正出于富有者自愿的，要说绝对没有，也不符合事实，实事求是的说法，那就是，凤凰之毛，麒麟之角，天底下，地上头，少得可怜罢了。

李石清大夫认为“富汉子吃药不花钱”，这一事实，在旧社会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里不难看出，地主豪绅和地方官吏，看病不花钱，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旧社会是官藉绅势，绅藉官威，狼狈为奸，欺压和剥削老百姓，这帮人吃药自然不肯花钱啦。倒不一定完全吝啬，无非借此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派头；另一方面是由于个别大夫，攀高枝，献殷勤、拉关系、抬高身价，主动不要药钱。但他们聪明之处盘算着，“失之东隅，还可以收之桑榆，其结果如愿以偿者寥寥，绝大多数人要落空的，本来旧社会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奇怪的。

以上略述了门头沟解放以前几十年的中西医的基本情况。

关于没落情况，部分中医和他们的药铺，是在1943年停诊和关闭的，共同的原因是日寇的疯狂掠夺，大旱的颗粒不收，造成人口锐减，（穷苦人家相继出外逃生），阖门里有生堂就是那年歇业的，即便开销不大，夫妻店药铺垮了的也很多。

1948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三个年头，也就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那年，国民党政府搞了一次（8.19）限检（限制物价不再往上涨），发行金元券（1：300）兑换法币，这是又一次玩弄手法，掠夺财富，自然也挽救不了他必然灭亡的命运。当时门头沟百业萧条，中西医自然也无法逃脱对他们必然降临的厄运。

限于篇幅，不再赘述，笔者衷心希望解放后在门头沟区医疗卫生系统工作的同仁，继续
笔撰与建国以来门头沟医药卫生事业蓬勃发展的绚丽多彩的新篇章。

解放初期宛平县的医疗卫生保健及斋堂医院

张万顺

宛平县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二年解放战争，几易其名，版图也几经变更，但基本上没有离开现门头沟区的范围。到一九五二年九月，宛平县与北京市第十六区合并，改称京西矿区之前，辖四个区，185个行政村，297个自然村落，75720口人。一区设在上清水，辖现齐家庄乡、黄塔乡、清水乡和斋堂镇西部诸村（柏峪、川底下、柏峪台、双石头、青龙涧、黄岭西、大三里）；二区设在后桑峪，辖现在的斋堂镇东部各村和沿河城乡、军响乡、雁翅镇、大村乡、田庄乡；三区设在陇驾庄，辖现在的上苇甸乡、妙峰山乡、军庄乡、北岭乡、色树坟乡、大台地区和海淀区的北安河乡；四区设在现房山区的金鸡台，辖史家营乡、大安山乡。

抗日战争之前，旧宛平县没有医院，只有一百二十九家药铺分散在各区村，希堂、清水、军响、沿河、青白口、田庄、大村等地计有二十余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基本上能坚持行医。如沿河城的黄国珠、李兴元、刘海沿、索振祥；煤窝的杨正芳、杨跃定父子；灵水的刘怀聚父子；桑峪的李华亭父子；川底下的韩怀普、黄岭西的曹氏兄弟；灵佑寺的和尚王宝来，上下清水的贾全鉴；东西斋堂的杜家、贾家、宋家、韩家；碣石的李家父子。

这一部分医生和药铺多为富户或殷实人家所设，他们的医疗卫生保健主要是乡间半农半医，学有一般的汤头、脉诀等中医理论，看病主要以脉诊、看诊、问诊辅以偏方，既成本低又方便易行，且多为义务互助，就是收费也极其微薄，有的只以酒食为礼相待即可。

除上法、偏方看病外，还有一种说法是“范气学”。“范”古谓模拟之意，是以古人以巫术为形式，并以某物模拟疾病之症状确定疾病名称。如：胸部以上疾病为上范；肚脐以上至心口为中范；肚脐至肛门为下范。症状如驴叫，头上仰，视为“毛驴范”，以钱刺，食黑豆以治疗；体黑青肿如鸟鸣谓：“老鸱范”；腹疼并从皮下挑出羊毛一样纤维状物谓羊毛范；还有“蚰蜒范”、“哑巴范”等共七十二种。

偏方治病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摸索出来的防治疾病的措施。如，外伤用尿冲，用榆树皮包扎伤口，咽喉肿痛用手指抠按，身疼用铜钱刮，擗面杖沾热油擗等。还有一些是气功和迷信色彩的巫术，如家人生病，门上挂桃木弓、柳木箭并用患者的鞋敲打门槛，呼其名以招其魂，有惊吓者则以水瓢或其衣物在其头上旋转并呼唤以招回所失之魂。拔火罐、放血、以板器拍打疼处、推拿按摩、热敷等至今在偏僻小村仍还应用。

解放前，大多数劳动人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根本谈不上什么医疗卫生保健。加之连年天灾兵祸，劳动人民贫病交加，在苦难的深渊中挣扎，“孤坟添新鬼，百里无鸡鸣。婴儿为狼食，瘟疫断人生。”各乡村缺父少母的家庭和鳏寡孤独比比皆是，差不多哪个村都有一个死婴沟，以葬不能入坟地的幼婴和儿童，小儿麻痹、天花、疟疾、伤寒、鼠疫、霍乱、结核等传染病严重危害着人民的生命。妇女因难产而断送生命者也时有发生，先天畸形和有生理缺陷者也较普遍。

一九三八年三月，我宛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后，为了抗日军民的健康，以赢得战争的胜利，党和政府以及医药界的爱国人士以最大的努力对医疗卫生保健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做了很多实际的工作。县政府设实业科兼司医药事业，八月，爱国民主人士黄

国珠在斋堂药社亲自坐堂行医。一九三九年七月，他自己开办药社并任主任，为抗日军民服务。不久，各大村凡有药铺的大都成立了药社。一九四三年夏季，宛平县药社在四区（现房山区）的秋林铺北头麻黄沟成立，故称“麻黄药社”。药社的韩晓峰、任成业、任成瑞主要以收售、加工药材，组织各区采药，开展医疗工作等方式行使县药社职能。为解决各区、村缺医少药的困难，县医药合作社收购本地药材后，一部分出售到游击区和敌占区，换回抗日军民所铺的西药及其它物品，一部分加工成中成药直接供应抗日军民所需。后来，县里又调张国江大夫到县药社工作，除为县政府所在地军民服务外，还每月到较远的村庄巡诊。日寇从我斋堂川溃逃后，县药社在西斋堂村铺立固定社址，租占民房十间。由于工作人员多来自清水河南岸各区、村，并兼开药铺坐堂看病，故游众称其为“南山堂”。后来，药社发展到三十多人，为宛平县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是时，药社主任为县副议长黄国珠担任，石儒为医生，于成文管行政，巩思九任会计。一区有罗金鉴所开上清水药社；二区有高明都、贾佩所开东斋堂药社、刘海沿所开沿河药社；三区有板桥药社、王平村药社等；四区有麻黄药社。

为将全县乡村医生组织起来，由黄国珠牵头组织了县医联合会，并亲任会长，培训医务人员，开发本地中草药资源，研制中成药，鼓励各乡村建立诊所，使全县的医疗卫生状况有了较大的变化。

一九四九年十月，宛平县人民政府为了加强对全县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领导，在县政府机关设卫生科，统管全县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科长陈文通、科员李芳铺。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时，开始成立县卫生所。一九五一年春改为宛平县卫生院，撤铺卫生科。县卫生院院址在桃园村，行使行政，业务双重职能，院长陈文通，都书李芳铺，政工张永彬，公共卫生霍安、石光兰；妇幼保健吕贤、关桂银；西医：黄文进；司药：张善述；护士：傅长远；会计：刘天仁。

一九五一年冬，河北省卫生厅经通州专署为宛平县拨发卫生事业建设专项资金一亿二千万（旧币），以建各区医疗预防站之用，到一九五二年初，各小区医疗预防站相继建成。

一区医疗预防站在铺水

主任：孙焕文（兼中医）

司药：张殿卿

护士：石秀德（也看病）

公共卫生：连维全

西医：耿凤祥

会计：谭哲

二区医疗预防站在桑峪

主任：石秀彬

司药：曹殿龙

护士：郭化民

防疫：屈宏铺

会计：于成文

妇幼：韩晓兰

因宛平县卫生院驻地在三区桃园村，故三区未再设医疗预防站。

四区医疗预防站在金鸡台

主任：石儒（兼大夫）

会计：任成业

司药：李春义

当时，全县除四区外，共有专业乡村医生 51 名，半农半医 36 名。（人员名单及其分布见附表）

一九五二年九月，宛平县及房山县、良乡县部分区、村与北京市第十六区合并为京西矿区，为加强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组织了卫生建设科。

科长：1952 年 9 月至 1953 年 5 月为田培；1953 年 5 月陈文通接任；1958 年 8 月王锡三继任。副科长：1953 年 5 月至 1958 年 10 月为博桂馨，1956 年 2 月加任杨正本为副科长。

京西矿区成立后，区政府对全区的医疗卫生事业极为重视，先后建立了清水卫生站、斋堂卫生站、太子墓卫生站、大台卫生站、金鸡台卫生站、周口店卫生站、河北卫生站、石门营联合诊所、磁家雾联合诊所、龙泉雾联合诊所、大台联合诊所、陇驾庄联合诊所、三家店联合诊所。一九五七年左右，还在军响建立了联合诊所，西斋堂建立了联合诊所，清水建立了联合诊所，还有沿河城、燕家台也都建立了联合诊所。又先后建立了清水、斋堂、太子墓、金鸡台、大台、周口店、河北等地的妇幼保健站。京西矿区医院、东辛房联合医院、区中医医院、区防疫站、区妇幼保健所，医疗卫生机构也先后建立。这些，区政协《文史资料》选刊第八期《门头沟区建国以来卫生工作概况》中已有记载，不再赘述。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主要是除害灭病，打预防针、种牛痘、消灭臭虫、虱子、苍蝇、蚊子、老鼠、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训练接生员，使人民的医疗保健事业得到极大的改善。医疗防疫工作者，步行串村走户，不计报酬、不计较工作时间，不怕山高路险，顶风抗暑，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密切了党群关系，为后来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群众进行着有形的社会主义教育，人民群众从心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

一九五八年六月，京西矿区改划为门头沟区后，全区医疗卫生机构又有一些大的变动，区委、区政府对全区的医疗卫生行政机构和医疗卫生保健机构作了一些大的调整。一九五八年十月改卫生建设科为门头沟区卫生局，原科长王锡三为局长。于一九五九年七月开始设副局长，当时为范玉立。同时，将清水卫生站及妇幼保健站合并，称清水门诊部，斋堂亦然。太子墓卫生站、妇幼保健站合并，迁址雁翅，称雁翅门诊部；大台卫生站、妇幼保健站合并，迁址色树坟，称色树坟门诊部。

作为抗日老根据地的斋堂川国办医疗卫生机构虽有一定发展，但由于山河阻隔，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不少病人因不能及时抢救而丧生，急性胰腺炎、肠梗阻、胆道蛔虫、自产难产、急性肺炎、急性阑尾炎等疾病仍严重危害着人们的生命。

一九五八年二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为解决斋堂川这一老革命根据地的交通问题，决定修建自雁翅经斋堂到清水的公路，军民施工队伍 5700 余人。这样一支庞大的施工队伍开进斋堂后，没有医务工作保障是不行的。这样，以一九五七年春动工修建的斋堂门诊部为基地，从同仁医院派来了外科、内科、妇产科医疗技术人员，他们工作在公路上，阵地在斋堂门诊部。还有北京医学院下放的医疗技术人员何仍文（外科主治医生）、毛传岩

(外科主治医)、口腔科李炳辉等。

一九五八年九月，斋堂公社成立，包括现在的齐家庄、黄塔、清水、军响和斋堂，面积731平方公里，人口3.46万，作为公社党政机关所在地的斋堂门诊部，其规模难以应付数万民众、数千施工人员的看病需要，特别是“斋堂公路”逐段开通，为人们到深山间小都市提供了方便，诸多患者及其家属，都把生的一线希望寄托在斋堂门诊部。这样，将斋堂门诊部的规模扩大，档次升格，扩建为斋堂医院已成为在所必须。故此，一九五八年底，将斋堂门诊部升格为区级医院。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五日，“斋堂公路”通车，斋堂医院方正式成立，更换公章及牌匾，医院成立后，第一任院长是张培民，没有党支部书记。因为当时只有焦克修、屈宏绪两名中共党员，所以，不能成立党支部，党的组织关系仍在公社机关支部。说是一所医院，其实还是门诊部原班人马，为解决其技术力量不足问题，使其接近一所医院的规模。一九六〇年十月，按照区政府的决定将清水门诊部合并到斋堂医院，并单独成立党支部，原清水门诊部主任孙焕文为党支部书记，屈宏绪为副书记。是时，斋堂医院房屋21间，病床10张，捷克产旧X-光机一台，因无电源尚不能使用，显微镜一台，因无人会用暂闲置，当时只设有内科、外科。

医院没有救护车，由区医院的李云峰、焦伯达轮流开车到斋堂医院值班。1961年，区医院拨给一辆车（美国道奇）供业务、生活使用。当时病人转院、送区医院的，就从斋堂送到雁翅，再从雁翅坐火车到门头沟。那时，只要有病人，无论货车、客车、铁路方面都想法给予解决。送城里住院的病人，要从斋堂出发经大村，跨四十五岭，越高崖，到南口北郊进城，就是区医院来值班的救护车也是从门头沟经南口、芹峪才到斋堂。1966年3月，“三雁公路”通车后才结束了这一绕道数百里的历史。后来，又分配给斋堂医院一辆南京跃进牌嘎斯汽车，用了十年。十年中，天天出车，不分早晚，也没有什么加班费与出车补助。当时主要送妇科难产和外伤病人。市里的医疗队到斋堂来，出车才大大减少。1970年斋堂修水库时，又为斋堂医院添了一台天津产120汽车，以保障修建水库民工医疗之用。到1989年已有两台救护车及一辆北京130汽车。

一九六五年，斋堂医院发展到28人，20多张病床，化验室虽有房间和部分设备，但技术设备不配套，还没有开展工作。十一月，市友谊医院由李秀、李玉岩、林胡春等组成的医疗队到斋堂医院。后来又调去郭振海、赫纪昌、邓社民等加强了斋堂医院的技术力量。放射科、化验科、内科、外科、妇科，还有口腔、中医、防疫、保健、眼科等医、科室逐步完善，人员增至40多人。我国著名的眼科专家张晓楼、同仁医院院长戴世明、坛医院胸外科主任尤尔兢等专家曾在斋堂一年多，为山区人民服务。内科主任姚金生在山区住一年有余，在斋堂医院进行传、帮、带，为当地群众治疗疾病，他们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市卫生局、区医院先后派医疗队到斋堂地区各乡村巡回医疗，他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工作不分白天黑夜，无论什么样的气候条件下，只要有病人，即刻出动，特别是那些远僻的小山村有了危重病人，他们克服重重困难赶到病人面前，直到病人转危为安才离开。为了抢救病人，没有药，长途跋涉也去购买，没有血源，医务人员伸出自己的胳膊。他们的事迹至今还在山区人民中传颂。不少老医务工作者、下放医务干部和医疗队成员，山区人民至今还念念不忘他们的名字。他们不仅为山区人民解除了病痛之苦，而且减轻了住院率，节省了经济开支，减少了经济负担。“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的担心消除了。

斋堂医院除为本地人民服务外，还要接治来自河北省涞水县、涿鹿县及怀来县的病人。约占全年接诊量的 20%。现任卫生局局长李金山在斋堂医院担任院长期间，曾多次组织医疗队到涞水县锣鼓台、庄里、北边桥一带巡回医疗，将首都人民的关心送到群众家中，受到群众的真诚欢迎，扩大了斋堂医院的影响。那里人民有一句对斋堂医院高度信任的话，“到斋堂医院就有救了”。由于技术力量的不断增强，外科胆囊切除，脾切除手术均可做，普通骨科也可接治；妇科剖腹产；内、儿科重度休克；流脑等都能接治。化验、输氧、麻醉都达到一定水平。曾有一婴儿先天性脊椎裂，市里几家大医院都不能接治，最后，到斋堂医院来，得到满意的治疗。区医院、矿务局医院也曾一度出现将病人转到斋堂医院治疗的现象。

斋堂医院自成立以来，还为整个地区培养了大批乡村医生，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重病到斋堂。

1969 年底，1970 年初修建斋堂水库，民工万余人，集中在斋堂附近。当时只有 40 余间房屋的斋堂医院就显得极其窄小了，为此，区政府决定对斋堂医院进行扩建。当时，医院、学校都归公社所属，于是选址在原斋堂中学操场，由水库指挥部协助施工，医院职工在党政领导带领下，自己动手上山伐木、运石头、和泥，于 1971 年建起了目前的斋堂医院。占地 6000 多平方米，房屋 120 多间，1900 多平方米。目前已增设 7 个医疗科室，计 92 人，1 个行政科计 23 人。大学本科毕业生 2 人；专科毕业生 19 人；中专毕业生 69 人；高中以下学历 25 人，全院总计 115 人。百分之八十以上为本地人，外阜医疗技术人员已为数不多。主治医 8 人；医师 22 人；医士 45 人；重大手术及抢救工作多需求助于区医院或转院。

目前，有 X-光机 2 台；B 超机 1 台；心电图仪 3 台；心电监护仪 1 台；钻牙机 1 台；万能手术床 1 台；洗胃机 3 台；吸引器 3 台；显微镜 3 台；电烤箱一台以及所需检化仪器等价值十万元各类医疗器械。

现斋堂医院地址低洼，且处在皇城峪沟口处，每逢雨季洪水下泻，多次遭水患之害，且当时房屋建造急促，质量不高，其设计及规模均已不适应本地区人民群众医疗卫生保健的需要。故此，市、区政府已决定重建斋堂医院，一座现代化的新型山城医院指日可见。

附一：宛平县一、二、三区乡村医生（专业、半农半医）人员名单及其分布（因四区现属房山区，故略）

一、个体开业医有：

沿河城：刘海言（供销社药部），沿河城利民诊所；

双石头：王九香；灵水村：刘怀聚；前桑峪：李华亭；张家村：刘芳莆；西胡林：石明经、赵金鉴；川底下：韩怀普；黄岭西：曹有广、曹友敬、曹有库；灵岳寺：王宝来（原灵岳寺院之和尚）、李庆增；杨家村：杨耀庭；马栏村：杨奎英（女）；西斋堂：杜宏奎；东斋堂：高明德、贾佩（供销社药部）、朱春林、韩丰庆、贾全昆；上清水：罗金鉴（供销社药部）、贾全鉴；下清水：刘广元；黄塔：杨守义；杜家庄：赵有荣；齐家庄：郑全智；燕家台：魏栋臣、李兴聚；碣石村：李国贤、李国政；珠窝村：李元勋；青白口：魏国兴；傅家台：傅万选；大村：高凤仪；淤白村：白永亮，板桥村：梁九和；桃园村：李瑞堂（供销社药部）；王平口：刘进贵、张进忠；王平村：姜凤鸣；色树坟：赵桂林；马各庄：安振东；韭园：杨志山；丁家滩：王济坤（女）；晓驾庄：李全义、佟学深；军

庄：马子玉；下苇甸：韩冠英；五里坨：黄国珠；

二、半农半医：

西大台：李复国；双石头：王春林；林子台：王学纯、李兴长；刘家峪：贾秀生、龙门口：李银祥；灵水村：刘文明；后桑峪：张广泽、杨文利、张进财；军响村：辛占、李瑞堂；张家村：张廷祯；西胡林：王培印；柏峪村：王汉池、覃英举；火村：向一、李春贵；川底下：韩晓臣、韩晓和；黄岭西：王希俭；白虎头：李全贵、郝有田、李家村：吕永禄；大二里：李万生；高铺：杜存超；牛战：刘维庸、蔡家岭：贾恩录、高斋：刘金玉；永斋堂：贾宏远、韩庆明、石铺：曹白口：孔祥辉；千军台：孔祥辉、一户：张怀普；丁家滩：杨凤朝；

附二：斋堂医院党、政领导一览表：

党支部书记：

刘焕文：1960.10—1965.10

谭天真：1965.10—1966.8

范玉立：1966.8—1970.1

刁恩弟：1970.1—1971.1（军代表）

巩桂林：1971.1—1972.12

谭天信：1973.12—1975.1

李宝慧：1975.1—1978.6

张慧云：1978.6—1981.6

朱军营：1981.6—1984.10

李金山：1984.10—1984.12

杨怀民：1985.1—1985.7

刘学生：1985.12—现任

副书记：

张培民：1959.1—1962

傅桂馨：1962—1966.8

范玉立：1966.8—1973

谭天信：1973—1975

李宝慧：1975—1978.6

李金山：1978.6—1984.12

杨怀民：1984.12—1985.5

刘学生：1985.5—现任

医院院长：

屈宏绪：1960.20—1966.8

白天成：1970.1—1971.1（军代表）

李宝慧：1973.3—1974.2

刘登石：1973.10—1975.4

杜巨宝: 1978.4 --1983

刘德森: 1979.3 --1981

曹有科: 1981 --1984

李庆芳: 1984 --1988

马丰来: 1989.6 --现任

副院长:

博桂~~鏊~~: 1966.8 --1968.8

艾瑞川: 1968.8 --1970.1

白天成: 1970.1 --1971.1 (军代表)

巩桂林: 1971.1 --1972.12

刘登石: 1973.10--1975.4

李金山: 1975.5 --1978.6

刘学生: 1983.10--1985.7

杨怀民: 1984.10--1985.1

朱军营: 1984.10--现任

史长国: 1985.7 --现任

门头沟十三会、九龙山庙会 和琉璃渠茶棚

安 久 亮



我国北方地区传统民间花会表演，大都与一定的庙会活动相联系，且凡有出会的地方，几乎都有茶棚的设置。这里介绍的是门头沟地区早已失传，但有着独特风格和丰富民俗文化内涵的一组民间社团活动。

一、门头沟十三会

门头沟十三会，是九龙山庙会的核心表演会档，或称之为九龙山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京郊民间会档中同宗教和行业、手工业生产联系最紧密的地方花会

群体。

门头沟，旧指门头沟区龙泉镇东辛房村以西到沟顶香儿窑一带，其中包括东辛房、西辛房、门头口、炉灰坡（今龙凤坡）、宽街、东店、中店、西店、梁桥、横岭根、上桥浮、孟家胡同、官园、拉拉壶、韩家河、香儿窑计16个自然村，是门头沟地区旧日以窑神庙为中心的小煤窑最集中的地区。这里的本地居民几乎世代全部以采煤、运煤为生。还有很多外地来此走窑挖煤的工人寄居。他们同这里煤业的兴衰息息相关。

门头沟十三会的历史很悠久，据说从明代就开始了。历经五百余年，其传统的会档和表演形式，走会的管理组织、方法等，依旧保留着古朴的风貌。

门头沟十三会俗称“十三会十九档”，十三会即：权会（开路会）、中幡会、大鼓会、驾会（娘娘驾）、大旗会、狮子会、杠箱会、七星会、支单会、牌楼会、小车会（云车会）、秧歌会（地秧歌）、道经会（伙计道）。还有一种说法是：权会、高跷会、大鼓会、吉祥音乐会、中幡会、秧歌会、五虎少林会、石锁会、杠箱会、狮子会、驾会、小车会。经过笔者采访比较发现，第二种说法中的一些会口是出自大峪村、龙泉雾村和三家庄等村。有些参加过走会的老人，对高跷、石锁、五虎少林等会口，肯定地说不在门头沟十三会之列。疑是因为参加九龙山庙会的会口较多，停会时间太久，记串了。所以，下述以第一种说法为佳。所谓十九档，除了上面的十三会以外，还有六个特殊的执事，各算一档。这六个特殊的执事分别为：两个蓝旗、两个传喻、一个头锣、一个二锣。每年走会前，十三会下帖子请各会档会头议事，十九档中除了三老会以外每档一份。

门头沟十三会的情况，很少见于史籍。同时，从清代末年到民国初年，由于政治腐败、军阀混战和兵燹频繁，这个会档中断了半个多世纪。到了三十年代初，由于社会动荡，又经过几年，日寇侵华战争又起，再次停顿至今（1937年走了最后一次会）。这样，当时的参加者不多，因此，仍健在的活动参与者，寥寥无几，知道的情况也不甚全面。这一

仍就收集到的材料，简要介绍一下与其它现存会口有别的会档的情况。

驾会：又称娘娘驾，主要表演的形式是接送九天娘娘神像凤驾。该会档一般由十儿人组成，包括抬驾人八个（四人抬，四人换肩），小执事四个，还有会头等。娘娘驾是由一个八仙桌两边各绑一根大竹杆组成，执事与会头拿黄底黑字拨子旗，会众（包括抬驾人）身着黄色衣裤。九龙山的庙宇，是以供奉九天玄女娘娘为主神的群庙。按照传统，为了求得煤业生产的兴旺安顺，除了在九龙山群庙中的娘娘殿内供有五尊娘娘泥塑像外，还有一个可移动的小型九天娘娘泥塑像，为九龙山庙内九天娘娘的替身。每年九月初一，当年的老会和驾会一起上九龙山接驾。接驾下山后，放置在龙凤坡村后山脚下靠近诸小煤窑中心地的九天庙。每年四月二十九，当年老会和驾会从九天庙接“娘娘驾”到东辛房村东什仿院的“行宫”。当天下午，走会开始，众会送驾上九龙山。到了山上，将“娘娘驾”摆放在娘娘殿内正中供奉的九天玄女娘娘像前，一直存放到九月初一。

杠箱会：亦称扛箱会，一说是娘娘的伴驾会。北京地区部分书籍提到了这一会档的部分情况。杠（扛）箱在前清据说是半官半私的东西，表演一种借饷的故事。头前先有八个人抬着四个有环的箱子，抬箱的人们有时候翻筋头，有时候跳着走，然而箱子上环子的响声永远按节合拍，没有错乱的时候。在箱子以后有一个官员穿着红袍，带着纱帽，骑在一根竹竿上。后面还有一柄大伞，当伪坐在轿上。一般观众可任意向骑在竹竿上的官员告状，打趣说笑。而扛竹竿的演员在走路的时候要喊唱着，装着官威，打起封建时期的架子来《北平的百戏》。杠箱会，该会有配角，肩抬杠箱在两旁，中间有一个竹子，杠箱官坐在其上，红袍般般，圆般纱帽，具有滑稽之形状，不时有告状人等与杠箱官互作谐谈，语词及歌唱《北平指南》。杠箱，一人扮候头玉带，候跨杠上，以二肩抬之。好事者拦路问难，则请浪笑语，以致众人欢笑。《京都风俗志》。（以上皆引自孙景琛、刘恩伯著《北京传统节令风俗和歌舞》，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这与参与其活动的老艺人回忆的情况基本吻合。

大旗会：主要是以表演一面大灵官旗为内容。灵官旗白布底，蓝布衬，呈竖长方形，五尺多宽，一丈多长（高）。上绘彩色灵官像。还有一面是绣的，到九龙山顶才候上。用一根长约丈四的竹竿中间挑起，顶部还有一根竹竿候穿撑起，中间和两边有三根拉绳牵住，以防止大旗歪倒伤人或毁坏。举旗人一般都有些功夫，边走边候举、顶、托、扛等技巧表演。周围亦有替代、执事、会众等十余人。

七般会：基本同大旗会。主要区别是表演七星旗。

支单会：以支应各会口走会、烧香为主要内容。走会形式是，会头在前，左肩斜挎一长方形小黄布包，内装一个本册。走会前，在东辛房什仿院内点录各会口到达情况，并记于表册内，告之老会会头，其他会众在旁支应。走会时，亦成一档，即兴表演。到了九龙山顶，支应各会口按顺序上香、擦香，并当场呼喊，“××会擦香×把”，对擦的少的，还要嘱咐“下回补上”等词语，并将情况记于表册内。

牌楼会：据说以梁桥村有一过街牌楼面得名，详情尚待调查了解。

蓝旗：走会时的两个重要执事。各手执一面蓝布旗，旗呈正方形，2.7尺见方，有一小竹竿为旗杆。其主要任务是，走会前，参与三老会组织的议事会；并了解清般当年走会沿线的情况，特别是哪有什么庙，要烧什么香，哪有什么井，可以休息喝水，哪有什么店铺，挂什么钱等；凡不符合要求的，都要提出修改意见，并督促限期更正；还要同三老会

头一起去看大会和吉祥会。走会那一天，在什仿院外接会，并送到辕门前。走会开始后，紧接着二锣，指挥全大队走会、上香、休息与处理途中事务。

传喻：走会时的两个重要执事。其职责基本同蓝旗，只是其地位相当于东宫太监。由于娘娘驾左右。走会前，在什仿院“娘娘行宫”内接会，不出辕门，还负责传递消息及老会的决定与安排，是连接老会和各会的中间人。

头锣、二锣：为走会时的两个鸣金开道官。

道经会：俗称伙计道。是为乡间道教音乐会。平时为丧葬事念经吹奏，走会时专与档。演奏者大都是窑工，俗称“伙计”。乐器主要是笙、管、笛、锣、鼓。据说曾专门派人到北京城内西单关帝庙科班学习。内部亦呈师传制度。解放后，只存三个师门弟子，近年已相继故去。

还有一个非十三会之内的，与其他处同名而不同形式的吉祥会。它是由窑窑主出资组织，由大会直接领导的会，俗称“富人班儿”。其会址在窑神庙内。主要职责是为窑主服务。为窑神庙服务，也参加十三会的走会活动，但必须三请才到。他们亦吹亦打，其乐器主要有碰星儿、档子、铙、笛子、管子和唢呐，俗称“星儿、趟儿、大钹锅、笛儿、管儿、小喇叭”。

门头沟各村的会档，大村独办，小村合办。大体分列情况如下：东辛房村的权会；西辛房村的中幡会、大鼓会；门头口村的狮子会；炉灰坡（龙凤坡）村的娘娘驾会；宽街的杠箱会；梁桥村的牌楼会；东店村的大旗会；中店村的七星会；西店村的支单会；横岭根村和天桥浮两村的小车会；孟家胡同和官园两村的地秧歌会；拉拉壶村、韩家沟村和杏儿窑三村合办的音乐会（道经会）。凡两村或三村合办一会的，再出蓝旗和传喻，正好四人。即所有自然村都有会档，参加走会的重大议事活动。

门头沟十三会走会的具体组织者是三老会。三老会中一个是老会，另外两个是帮办老会，每年按传统沿袭的顺序接传，名为传老会。门头沟十三会的最高组织者是大会（有关大会的情况下节单述）。每年农历二十五，除了要以老会的名义下贴子请其他会档的会头外，还要以三老会的名义，派人手持老会拨子旗，持贴去请琉璃渠水茶老会的会头，特别是要由三老会会头派蓝旗官，一向由知亲自到窑神庙，三请大会会首和吉祥会会头。众会头齐到老会所在村聚会，商定当年走会、进香的有关事宜。议事完毕，老会村管一顿饭，俗称“吃会”。

门头沟十三会的走会活动甚是壮观。俗话说“九龙山的会大绕弯。”从东辛房村东的什仿院、老爷庙起会，沿门头沟旧日大道向西，过西辛房、门头口、炉灰坡、宽街等直至风口庵顶的杏儿窑，然后拐向东来上九龙山西平岭。途经 16 村，行程 20 余华里山道。他们过街起舞，遇庙（庵）烧香。沿途村民携亲带友空居拥巷，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从农历四月二十九下午三点左右起会，一直走会表演到天黑上至山顶。据说，门头沟十三会走会最盛时，曾一次走到琉璃渠，然后又折回上山，行程达 50 余里。

二、九龙山庙会

九龙山庙会，是旧日京都郊垆地方最大的行业庙会。其很少见于史籍。即使是近现代北京许多游记与考察中也罕为记载。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因其行业色彩太浓了。为政治的统治者和文人墨客知之甚少，犹如这里很有民俗特色的窑神庙祭窑神活动一样。

九龙山是门头沟地方很重要的一座山峰，居于门头沟东部。九龙山的庙宇，是由六

互不相连的五处殿庙组成的（其中四处为庙，一处为琉璃渠茶棚）。俗语统称娘娘庙，据说：原打算按八卦形式修七处庙，后来仅修了四处（一说五处）。它们分别是迴香殿，坐南朝北，三间，内摆供一娘娘像，为“扫殿会”的落脚地；灵官殿，坐东朝西，三间，内摆供一灵官泥像，为大旗会的落脚地；娘娘殿，坐西朝东，挨靠迴香殿，五间，内摆五座娘娘泥像，从五月初一到九月初一，为六座，其中中间为九天玄女像，一大一小，为驾会的落脚地；老爷殿，坐西朝东，挨靠娘娘殿，五间，内摆五座神像，中间是关公老爷像，为杠箱会的落脚地。在娘娘殿和老爷殿东边丈许地，座落着坐西朝东三间大殿房为琉璃渠茶棚。这一组庙宇最大的特点是空场特别大，没有庙墙相围。这个空场东西约 300 米，南北 200 米左右，中间有一口井和圆底石座的大旗杆，空场平坦光净，平日有看庙道人收拾、整理，庙会那一天，各会口在这里表演，商人小贩在这里做买卖，甚是热闹。

九龙山娘娘庙，是门头沟地方窑主和窑工集资兴建的。据说，始建于明代末年。如今，旧址上仅存一残碑，为清康熙年间宣武门商民所立，字迹已模糊不清。琉璃渠村存一标有“九龙山琉璃渠茶棚，大清嘉庆癸亥年”字样的钱粮挑，据说是换置的，以前有过一个旧的坏了，因此，此庙会最晚也是清初兴办起来的。

九龙山庙会，是门头沟一带有很大影响，规模宏大的民间祭神盛会，其进香朝山的大道有三条：正道称西平岭，即从宽街，东店，香儿窑桥东而赴庙会的大道，为门头沟十三会和门头沟一带窑主及乡民进香的道路；中道称中平岭，从西龙门，门头口，龙凤坡北坡上九龙山的大道，为门头沟外大峪，城子一带村民，乡绅的进香路线；东北道称东平岭，从龙泉雾、琉璃渠南山直上九龙山的大道，为三家店、龙泉雾、斜河涧、琉璃渠村等地的乡民、商贾进香的路线，此外，还有一西北小道，为王平村、色树坟、落坡岭、石古崖、非园、马各庄等地的香客进香的路线。据说王平口、十字道、安家滩等地亦有香客前来进香，一般走西平岭。

九龙山庙会上，不仅有门头沟地方的十四个会档进行表演，而且，还有东、西龙门村的高跷会；大峪村的高跷会；五虎少林会；城子村的高跷会；三家店村的高跷会；龙泉雾村的饺子会、地秧歌、石锁会；琉璃渠村的音乐道会、五虎少林会以及附近村落的其他会档。除了花会表演外，各村锁以至北京城内的商人、小贩亦从四面八方云集九龙江顶。有卖百货的、卖小孩玩具的、卖工具的、卖风味小吃的等等，各种商品应有尽有。进香的香客，来自门头沟左右凡开有小煤窑及与煤有关的村落。据老人们回忆其影响四界大致为，往西可达大台、板桥，往南可达潭柘寺、鲁家滩，往北可达三家店，往东可达北京城。每年从农历的四月二十九晚上，到五月初一上午，三条大道上，进香的人群一拨儿接一拨儿，比过年赶集还热闹。九龙江顶的大场院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

九龙山庙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农历五月初一上午半天。四月二十九下午，一群愿尽善心的老太太，在“扫殿会”的组织下，先登上九龙山，清扫各殿堂的尘土。“扫殿会”是由几个被称作“香头”的农村神婆子组织的。他们在四月二十九这一天，招呼事先组织好的、愿意上山扫殿的各村老太太，拿上新笤帚和新扫帚、新掸子等先期上山，将各殿堂打扫干净后，歇息在迴香殿。第二天再和大家一起烧香。五月初一早晨天亮以后，由大会会头先上头炷香，然后是老会和帮办老会的会头，接着是各会档的会头、会众及各色人等上香。上完香的会档便在大场院上支摊表演。大约到了上午 10 点钟左右，看庙的老道在大场院中间，用三大捆木柴摆好一个柴堆，然后，支单会的会头招呼各会档停止表演，聚集